

政协天津市南开区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工作委员会

主 任 陈翟生

副主任 梁维民

委 员 周祐昌 朱振周
薛震海 王连铎

《文史资料》编辑委员会

主 编 陈翟生

副主编 梁维民

责任编辑 于金祥

目 录

一、《石头记会真》序	周祐昌	1
二、发生在咸水沽	周汝昌	3
三、解放前小站的工商运输业	王景云	9
四、葛沽镇旧时商业概貌	孙树芳	32
五、旧时天津名校——高庄子 李氏私立小学	梁维民	47
六、小站镇旧时教育状况	王景云	60
七、周锐小传	赵立方	69
八、葛沽辇会	刘虎臣	62
九、葛沽诗辑存	缪志明	65
十、建国以来天津南郊公路建设概况	周绍贤	85
十一、咸水沽海运旧事琐记	蔡胜利	91
十二、郝长福与福兴汽车公司	朱振周	96
十三、小站讲武堂	刘景州	98

《石头记会真》序

周祐昌

文史纂乱，古已有之，只是象《红楼梦》这样遭遇之醜的，还没见过。《会真》着手四十年，迟滞原因，不外酝酿等待、探索、实验，参差起落，中间还夹着动乱，覆巢难收，拾又拾不现，放也放不下，经常停工待料，空白候补，随钞随废，清不起来，材料是作到了等到了，形式是作到了摸到了，不是那么左宜右有，从容暇逸。其中如甲、庚、蒙、觉诸本，尚属首用，距印刷大远，勿遭检校，纰漏随之。这是和本编的要求不相容的。

但是，我们抱定“扫荡烟埃，斥伪返本，积年烟郁，一旦豁然”的崇高理想，深信解决问题，《会真》是必经之路，露钞雪纂，此志不渝，就是提端引绪也好。书中说过：“这是一件正紧大事，大家鼓舞起来，不要你推我让的；各有主意，自管说出来，大家平章。”（脂砚斋于此批曰：“这是正紧大事已妙，且曰平章更妙，的是宝玉的口角”。）这几句话说得真好，读者都有责任，把这件事“作兴起来”，朝着“如今这事，八下里水落石出了”的方向迈进，不达目的不止。

汝昌曾说，“至于我们自己呢，志趣并不仅仅在于一个简单的新校本，要解决的是比那复杂百倍的无数疑难问题，是更加深入细

致地探索真伪混乱纷纭万状的各种原由和审辨方法”。《会真》在探索混乱原由和审辨方法上初步有所突破，打开局面。接着在《会真》基础上作统计、作说明，统计结论反过来修订《会》，这一桩大公案，大算题由求证一直到解答，保存原书真相，以底于大成，有所归依，有所信奉，有所推行，到那时这件事才可以说于是乎毕矣；扎根不实的恶果，历史颠倒的悖乱，不能再持续下去了。

本编宗旨《石头记鉴真》中阐述具详，那实际就是《会真》的一篇序。要了解《会真》，《鉴真》是离不开的，读者青目，诚厚惠焉。

一九八八年十二月十七日，戊辰十一月初九日，祐昌记。

发生在咸水沽……

周汝昌

这件事情发生在天津市南郊区咸水沽。这件事情关系着中华文化史上真理与骗局谁胜谁负的重大问题，因此南郊区政协的文史刊物要我来写一写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以及个人的感想，我就答应下来了。此刻提起笔来，觉得这个写作任务说简单似乎数语可了，说繁难则又万言难尽，如何写法最好，斟酌未定，而截稿之期将届，于是我就只有“信笔所之”一个下策了。

要说简单的话，就是这样子：在咸水沽这块不为人知的弹丸之地上，有兄弟二人，为了力争真仿之大辨，是非之正义，苦苦经营了整四十年，结果是作成了一部题名《石头记求真》的巨大书稿，这部书稿，目的是恢复我中华民族伟大文学巨星曹雪芹的久遭窜乱歪曲的《红楼梦》的原貌和本真，这样一说，也就“够”了。

要往繁里说，那就是非常麻烦的事，如不嫌絮絮，且听一讲：

世间万物有真有假，假傍真生，如影随形；久而久之，假夺真以兴荣，真避假而沦灭。这是我们文化史上的异象，最为可悲可痛。

越是真好的东西，真正宝贵难得的东西，才越有假的来冒充，来欺骗，来害人。这是一条规律，《红楼梦》真失而假存，正说明了那真的之好，之宝贵。

~ 8 ~

因此，我们要来求那个真，恢复那个真。

真的，才是善的，美的，把丑恶的假东西留给子孙后代，是犯罪，是对不起炎黄之列位祖先。

我们因此而决意奋斗到底，到今整整四十个寒来暑往。

《红楼梦》如何会冒出假的来呢？又怎么能产生得出的呢？

原来，这事起因于乾隆朝后期编纂《四库全书》，《全书》之纂，本是好事，但因前史旧籍，时有不利于清廷的各种记载，于是便想出了篡改以至销毁书籍的阴谋诡计。除大量焚毁外，最常用的手段是删、改、抽、撤，书的外形似全似真，可是内容变了，而一般阅者不得而知其奥秘。乾隆的宠臣和珅，后来执掌了修书和其他文化事务的大权，便将删改抽撤的办法推广到民间通俗文学上去，所以小说野史，唱词戏本，其意义重大，影响巨大的，也遭到了同样或相似的命运。

《红楼梦》本已完成全稿，而后来却只剩了八十回传世；再后来，忽然又出现了一个“全本”，竟比八十回多出了四十回。煞是可疑。

更耐人寻味的是：伪续的主要代表人物高鹗，在书前边竟敢用上“臣鹗”的官印，还特别指明“此书久为名公钜卿所赏”！怎么原来是禁书的《石头记》，售者、阅者都有避忌的《石头记》，一下子变得如此“堂皇正大”，“光明磊落”起来了呢？岂不是天大

的怪事？：

当时已有明眼人识破，但不敢明讲，只有微言暗示。乾隆朝的吴云〔不是同治时代的同名者〕和稍后的著名学者宋翔凤等，就记下了《红楼梦》是在“《四库全书》告成时”才开始流布——公开地印行面世，以及和珅与乾隆“讨论”《红楼梦》问题的事实。

假《红楼梦》就是由和珅主张，聘请高鹗等人炮制产生的，它的目的就是篡改歪曲，以假代真，淆乱耳目，欺世惑民。

关于这些事，请参看拙著《红楼梦‘全璧’的背后》，1980年国际红学会论文，今收入《献芹集》内。

粗陈此义，然后方可进而说明我们四十年苦心与苦工，毕竟所因何故？所为何来？

我与家兄祐昌达到此一认识，发端于三十年代后期，后来有到了胡适先生惠借的珍稀之孤本《甲戌本石头记》（还有一部有正大字底序本）与陶沫先生惠借的《庚辰本》照相本。这些经过和情景，在拙著《石头记考真》的《书后》中有较为生动的记叙。一九五三年秋，拙著《红楼梦新证》出版，三个月内，连续三版，供不应求，在英伦的华人和在美国的学者们都称为异事。这书出后，才引起了古抄本《石头记》的影印与研究，这是红学史上的第一次八十回本真书大普及（以前只有极少数人士藏、见此和珍本）。更重要的是，由此引起人们对抄本的认识与重视，发现与挖掘。于是一个接一个

的古抄本陆续重现于人间。到目前为止，已积有十二种之多（“文革”中遭毁的尚所不计）。这就给我们的“会真”工作提供了条件。

我们起意从事这一盛业，早在一九四七年，我与胡适通信时，就提议此事，乃是当务之急。他回信说，这个工作极笨重，所以无人敢于承担。其实，那时才只有三个真本可供汇校，事非大难，事情的实质是个认识的问题，当时有条件的人，坐视无动于衷，——看不中古抄本是雪芹真本，也不认识真伪之间的巨大差别，相反，对伪本总抱着温情脉脉的心态。

在此情况下，我们兄弟二人才立下决心，不论如何，也要完成大汇校，并写定一个真本的事业。

为此，我们在艰苦无比的条件下独立坚持奋斗，这四十年岁月，是不寻常的。枯昌是露钞雪纂，积稿与身等高。中经劫难，片纸不存。春风再拂，便又重新迈步，从头作起，……其艰苦度与工作量之可惊可叹，都不是我这支笔所能描绘其万一的。

我们二人数十年来彼此鼓舞勉励，相濡以沫。不曾停顿过的信札往来，包括诗词倡和，最离不开的主题都是为了这个事业的商量计议。

枯昌今年七十有六了，我也七十过一。为了雪芹的真书，为了中华的文化，象痴人那样，置其它一切于不顾，一心为了实现这个宏愿。因为这不是个人的得失利害的小事一段。

这、是一种如战死似的“校勘”，寻出“异文”，“某本作某”，就算“成绩”，不是那种东西，我们是从复杂万状的真伪，是非、正误、高下、优劣、精粗……中去识别，去解“九连环”，去梳乱丝，从百样讹错错乱中找出雪芹的原文来。这是一种高层次的工作，包括高度文化水平与审美能力。一字之微，也关系着雪芹的头脑，心灵、笔墨、才华、品格的这样的一种高深的课题，这不是儿戏的事，更不是文人雅士的消闲解闷，所谓“胜于博奕”的勾当，这是一项关系着全民族文化素质的大事。

雪芹真本，好在哪儿？其思想极为博大，境界至为崇高，为千芳一哭（冠），为万艳同悲（杯），他写了一百零八个不幸女子的遭遇与结局，为人材而痛惜，为命运而悲愤。

高鹗伪本，坏在何处？他处心积虑，割掉上述巨大内容义蕴，却在“宝黛爱情”上作了些表面文章，把人们引向一个庸俗的，廉价的“小悲剧”（鲁迅先生语）上去。这个小悲剧，以“掉包计”为枢纽，实际是一场小闹剧而已。它让人们发生错觉，专门去“认”什么“钗黛争婚”那一套——西方读者以为这不过是争风吃醋式的“三角恋爱”，毫无“伟大”可言。拿这个去冒充中华文化的最伟大最光辉的代表作品，岂不是一种自诬和自唾？

我们的努力，应该不致于徒然，不致于白费。

我们希望这部“会真”——会雪芹原书之真——能够问世。发

挥其应有的作用。

但从目前看，出版界情形很不正常，无人肯来承担这种性质和数量的书物，因为无利可图。一条路，是自费印行。但我和祐昌，清贫一世，又不会经商发财致富，拿不出这笔印书费。此种实情，无庸讳言。那么这部书稿的命运毕竟如何？现即也还无从说起。安得今有古道热肠的义士，予我臂助乎。这不是助我们个人，是助中华文化之宏扬光大。（其实印书费只是借用，印成售书，可收回成本）。

我生长于咸水沽，现在有机会向故里的乡亲报告这么一些梗概之情，自觉非常荣幸。匆促之下，写得不详不备，也缺少精彩，还望阅者多加原谅，并予指正。

咸水沽，古来滨海斥鹵之乡，今亦不齿于“大雅”之陋壤也，但此地也许与中华文化史上的一桩大事发生联系，这一点倒是乡亲们该当想到的。

戊辰十一月，进二九之夜，

一九八八年十二月三十日灯下，

周汝昌记于北京东城寓斋。

解放前小站的工商运输业

王景云

一 小站商业的产生与发展

小站镇的历史已逾百年，它是随着马厂减河的开挖、小站稻的拓植而发展兴盛起来的。早在1875年2月李鸿章准军中景大的一支“盛字军”一万余人，在周盛传弟兄的统帅之下，移屯小站，拓植稻田，其亲军营即设在小营盘（即今小站东粮库处）。小站由于地处滨海，盐碱荒滩，所以“居人廖廖，负贩绝迹”。一应日常军需难以购置，士兵购物需赴数十里之外的咸水沽、葛沽等处，极为不便。为此周氏兄弟在亲军营南侧，沿马厂减河筑城为镇，名之为“新农镇”即今小站镇。设东、西、北三门，其中东西城门楼均雕刻有“新农镇”三个大字。城内设东西走向的“行营买卖街”一条。从此葛沽、咸水沽、唐官屯等地名商大贾纷纷聚来，或创实业，或设分号，小商小贩亦云集于此，均以服务驻军为生意目标。当时冀、鲁、皖等地贫苦农民也纷纷移居小站垦区，认耕领种，人口日渐稠密，新农镇从此渐成小站一带经济贸易中心，小站的商业由此产生并逐步发展起来。

甲午中日战争爆发，原驻小站的盛军溃散。1894年底清政

~ 9 ~

府决定由胡燏芬在小站训练新式陆军——“定武军”。1895年12月21日，肩负练兵重任的袁世凯到达小站接收“定武军”，并迅速扩编为步、马、炮、工辎各兵种齐全的近代化“新建陆军”，戊戌政变后增至1万余人，1904年编制成“镇”，分驻小站和马厂。自此小站成为北洋军的发祥与久驻之地。新建陆军倍受清政府的青睐，被视为“自强之关键”，由户部直接供饷，饷银每年近百万两，在当时清政府各军中待遇最优，即所谓“一兵吃穿百十两，六品官俸一般同”。据1902年6月袁世凯所定《北洋常备军营制饷章》之规定，每一常备兵月饷银为4两2钱之多，这近万人的驻军需要就近采购大量商品。这充足的饷银也将有相当数量花费在小站，所以随袁世凯大规模的练兵，小站商业及交通，运输在20世纪初期又进一步发展和兴旺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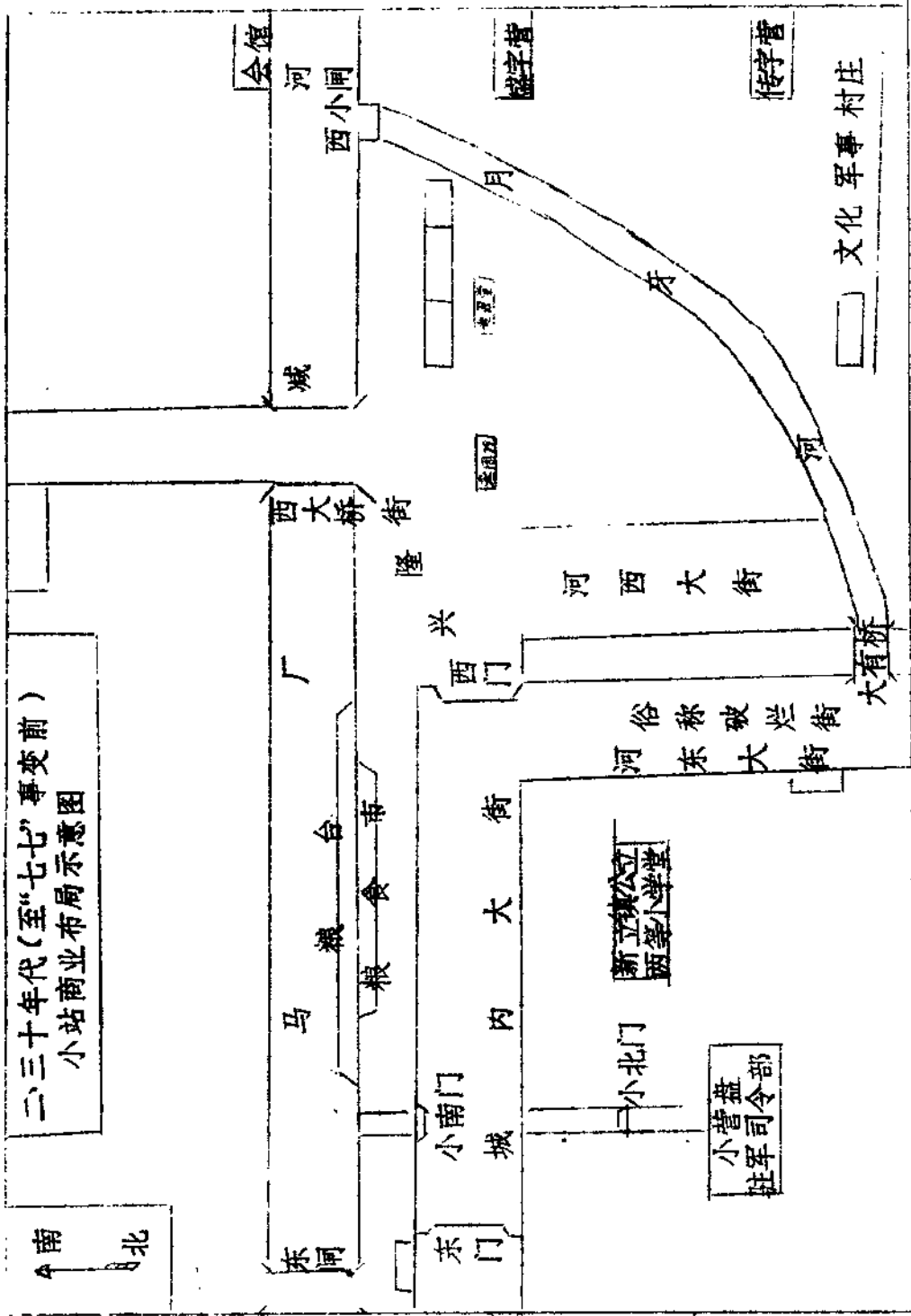
北洋军覆亡后，在三十年代初小站仍为国民党军队驻军基地，小营盘仍是驻军的司令部。有熊式辉胡子军，军纪很差，骚扰商民，为害最甚。有一麻脸司务长手提皮鞭经常寻机打人。赌博输红眼，闯进理发馆把顾客乱打一气，他们还把“德兴厚”布店学徒打得满街滚，疼得把旁边一个土筐折在自己头上。老板出来拿钱赔笑脸才算了事。夏天，一伙胡子军在减河中洗澡，河水上涨，他们又不甚通水性挨了淹，于是岸上的胡子军就用武力驱赶街上来往人群及商

~10~

店的学徒掌柜·下河救人”，不管是否会水，被纷纷赶到河中。胡子兵的横行霸道使小站的商业遭到破坏。在“七七”事变前有国民党29军黄维刚旅进驻小站，司令部设在小营盘，29军军纪较为严明，平时士兵都驻扎在军营之内，不准上街胡作非为。有一下等的军官未经允许到街上看“庙会”，即被黄旅长责令当众打20军棍。由司务长上街购物，公平交易，非常客气。东门站岗的士兵对过往客商也都说话和气规规矩矩。可是对地痞土匪则严惩不贷。当时海下一有名土匪头子张兆甫，为害乡里，无恶不作，民愤极大。黄旅长严令将其搜捕归案，扣押在小站。据说张兆甫有钱有势，通过巨额贿赂，买通南京中央政府要员赦免。而黄维刚决意为民除害提前在腊月二十，将其拖出小站东门枪毙，人心大快。平时旅部有一黄姓军法官经常带令值勤士兵查街，以维持治安，镇上秩序井然，小站商业秩序稳定，至今人们谈起黄维刚旅，莫不交口称赞。

三 小站商业的分布

二十世纪初期至三十年代（“七七”事变前）小站镇人口稠密，商贾云集。在宽阔的东西大街上，商号鳞次栉比，生意兴隆。有著名商铺三十余家。此后近二十年间由于日寇侵占，兵匪战乱，历经磨难。到解放时多已不复存在。时至今日，多为人们所遗忘。但其毕竟为小站地区的开发进步发挥过积极的历史作用。现在据调查回忆，将其当时小站商业布局概况图示如下。（附图）



三、颇有名气的老字号

小站有所谓“四大绅士”，几乎家喻户晓。这就是著名的“天泉涌”大酒店掌柜王印堂、资本雄厚的“德升厚”大布店老板张济州。以及中药店“春和堂”老板张桐山与“春生堂”老板王绍南（又名王翠）。他们有权有势，社交频繁。有的刻意经营，谋取高额利润，更有的为富不仁，祸害人民。现将几家著名商店简介如下。

1、“天泉涌”酒店。

“天泉涌”俗称为“天泉”。名为大酒店，实则以经营醋、酱油及各种酱菜制品为主。它在今小站五金商店对门，有30余间房屋，分前后两个院落。后院一直延展到岸边，前院临小站繁兴的大街。有3间门脸，玻璃考究的活动铁门。有兰色大门帘，上书“天泉”两个正楷大字，格外引人注目。白酒由咸水沽总号进货，其它醋、酱油及各种酱菜均为自制。有师傅徒弟20余人。以批发各商贩为主，同时也大量零售。掌柜王印堂是位“吃股掌柜”。本人无股份，由股东盈利中按成分红。东家为赫赫有名的阎瑞五，阎家圈一带的田地苇湖即其祖传家业。阎家还有三个大商店，分别为新城“天泉”咸水沽“天泉”、天津“天申”造膜公司。他常任天津或咸水沽。日本投降后曾任“天津县参议”、“天津县商会会长”。解放后被判徒刑死在狱中。“天泉”的经营一直到解放，到公私合营为止。

2、“德升厚”大布店

“德升厚”资本雄厚，原为张、王、唐三家合股开办。后由于唐、王两家先后退股，即由张济川独家经营。在小站有店铺三处，即总号“德升厚”（俗称东号，今小站卫生院门诊楼处）。“德成厚”（俗称西号，今小站五金部）主要经营绸缎、棉布，兼营化肥、豆饼等。还有“德升厚”（俗称南号，为总号之对门）主要经营估衣、旧物，后来成为储存布匹、化肥、豆饼等物的仓库。三处总计房屋十八间。此外，在今供销社处尚有一片住宅。

总号有坐北朝南三间门脸，门前有宽两米的前廊，悬挂着巨大的横幅布帐，上书“德升厚大布店”六个大字。店铺内光线柔和，各色绸缎、布匹琳琅满目，色调显得格外好看。有专门管事掌柜、记帐先生、同事与学徒。总号总计有20余人。学徒无工资，但供吃穿，年终结大帐时有所馈赠。在小站赊欠方式是一项主要的经营手段，对附近乡里的大户人家均可记帐赊售，只待秋后稻谷一收，再清理帐目。同时稻地户还可将所售稻谷钱贮存入“德升厚”，随时支取，但无利息，这也是其资本的重要来源。

“德升厚”文明经商，注重信誉。清晨开市前学徒首先清扫街道做店內卫生，天黑上门后先生查帐，学徒盘点货物，学习珠算至深夜。上至掌柜，下至学徒均身穿大褂、系腿带、边幅整洁、注重仪表，礼貌待客，一团和气。平时，卖布学徒所量尺码，都稍有富

裕，以童叟无欺、服务周到广泛招揽顾客。凡有需求，还可预先告知。届时学徒即用大包袱皮裹好各色布匹，肩扛手提送货上门，甚至可以往返再三，任凭顾客随意挑选，直到满意为止。平日买卖兴隆，秋收之后直至年关，更进入生意高潮。顾客盈门，水泄不通。同事、学徒虽站满柜台，仍应接不暇。“七七”事变日寇侵入小站，加以土匪横行，“德升厚”布店被迫关闭，从而中断了多年苦心经营的生意。

3、回民名店“中三元”

小站回民比较集中，有多家回民经营的商号，如“庆兴德”（干鲜果品店）、“德发成”（点心杂货店）、“太和和”（农具店）、“德盛兴”（杂货店）与“中三元”等。其中以“中三元”最为有名。“中三元”分为两个店铺，由马步云等兄弟七人共同经营。主店在今十字路口岗亭，经营牛羊肉及切面；分店在城河老大桥边经营干鲜副食。在今清真寺附近有马氏羊圈，多时可达千百只。

“中三元”还派专人远至“口外”购买羊群。一次数百只，由人边放牧，边驱赶长途跋涉直至小站。“国外”羊肉既肥美又干净，味道极鲜。如水和馅，格外出数，所以深受广大回、汉民的欢迎。“

“要想买牛羊肉，要到中三元”，已成为当地人们的俗语，其它各家无法匹敌。当时肉价也比较低廉，农民担柴草一担，在小站出售后，除一般吃喝花用外，还可买一包羊肉带回，全家享用。